

隐士的真谛

马正华
陈正宏

隐士的真谛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前 言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情趣不同，信仰有别。他们各有其一块生活天地，各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特色，真可谓千姿百态，斑斓多彩。正是这众生众相构成了人类社会纷纭复杂的面貌，形成了人类社会的不同生活层面。人类社会由古到今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段，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时尚和习俗。但是人类既共生于同一地球之上，这就使得人类不管有多少发展变化，各民族、各地域、各层面的人们生活有多大差异，他们彼此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古今中外这种错综复杂的联系就交织成了人类生存的关系网。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意识到没意识到，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样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世网之中。因此，了解古今中外他人的生活面貌，透视人间的世相百态，确认自己在人生社会中的坐标地位，对每一个人怎样度过自己短暂的一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要编辑《世相百态》这样一套丛书。

这套丛书分四辑，共二十册，以认识中国世相为中心，兼顾域外人生百态。每一册叙一人生层面，或一种人的处世方式及其作为。

第一辑（信则灵）五册：讲人生信仰各异。

《批而不倒的儒》述两千多年来儒的兴起、发展及对中国社会、民生的影响，虽历经批判却依然独立于世，并日益为世

界所景仰。《佛在心中坐》叙佛从域外传入中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影响中国社会与民众，人们如何常念南无阿弥陀佛。《神在何方》讲中国的神崇拜，神无处不在，时时处处事事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行动。《隐士的真谛》则叙无论何种信仰，入世也罢，出世也罢，隐士则不受其拘束，自行其事，自得其乐。《名医起死回生录》则叙不论何等信仰，也不管为仕为隐，为僧为道，凡为医，则以救人性命解人病痛为己任。

第二辑(勇为先)五册：讲人生行事有别。

《侠客肝胆录》叙从古到今行仗仗义救人危难之侠客行事，其特色在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刺客纵横谈》叙刀光剑影血溅红尘身亡名存之刺客行事，其特色在于受人所使。《沙场英雄豪情》写驰骋疆场报效君国之英雄行事，其特色在于忠君报国万死不辞。《天涯浪子风云录》则叙说人生得意失意之际的浪子行事，其特点是牢骚满腹，行踪难定。《成王败寇的疑惑》乃述说人生奋斗有成功也有失败，是否“成则王侯败则贼”呢？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入探讨的社会课题。

第三辑(恣情性)五册：讲人生生活情态。

《商人与经商术》叙商人谋利之术及其甘苦。《名人与饮食》叙人以食为天以及人生口味各别，各得其乐。《青楼烟花梦》叙男娼女妓为他人取乐以及他们自身的得失。《人的外包装》叙人生穿衣戴帽各有所好，然而却又受到种种限制。《人生娱乐百相》乃讲说帝王将相文臣武将黎民百姓平日及年节各有所乐。

第四辑(谋在人)五册：讲政治风云变幻。

《外交场上风云莫测》叙没有硝烟的外交战全在于机谋权变。《亡国帝王的哀痛》叙朝代更迭君王失策身亡国破之哀。

《名人与法》叙立法执法与权谋的关系得失。《小人得志更猖狂》讲述小人为奸坑害忠良颠覆社稷种种劣迹。《一朝天子一朝臣》则叙述改朝换代政策变化对人的命运前程的巨大影响。

全套丛书叙述了社会不同层面、不同品位的各种人的信仰、行事、情态及其遭遇。虽说不能完全概括大千世界的众生众相，但已涉及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经济、教育、科技、饮食、娱乐、宗教、习俗等各个方面，述说了帝王将相、文臣武将、僧道儒医、商贾娼妓、浪子隐士、侠客刺客、奸小英杰、黎庶百姓等各种人物。这形形色色人物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风云际会、闲情逸致可以说尽收于此书之中，读者从中自可窥见人生世相百态千情，也自会各有领悟，各得所益。

由于丛书各辑各册内容不同，作者才情、学识有异，每册所叙人事多寡、时地范围以及文笔风格也略有差别。但我以为皆大体未离世相百态之宗旨。每一册都可以说材料充实、观点鲜明、文风朴素。此丛书与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之类不可同日而语。它的价值，读者阅后自会有肯切的评价。

主编 门焜

1996年元月于津门知不足斋

目 录

前言	(1)
一 中国的隐士文化	(3)
(一)隐士是什么人	(3)
(二)隐士文化与中国农业文明	(10)
(三)隐士文化与士大夫传统	(16)
二 隐士的人生态度	(23)
(一)生生死死的困惑	(23)
(二)功名富贵 过眼云烟	(28)
(三)隐士与佛道	(34)
三 隐士与社会政治	(41)
(一)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	(41)
(二)隐士与社会教化	(47)
(三)入彀与不入彀	(52)
(四)终南捷径与“山中宰相”	(58)
四 隐士与自然	(65)
(一)自然之美的哲思	(65)

	(二)田园情趣·····	(70)
	(三)隐士与园林·····	(75)
五	隐士的日常生活·····	(81)
	(一)物质的贫乏与精神的富足·····	(81)
	(二)隐士的吃穿·····	(88)
	(三)隐士的住处·····	(93)
	(四)隐士的婚姻·····	(98)
六	隐士的学术生涯·····	(104)
	(一)沉溺书海·····	(104)
	(二)聚徒讲学·····	(109)
	(三)隐士与《易》学·····	(112)
	(四)隐士与史学·····	(116)
七	隐士的艺术创造·····	(120)
	(一)隐士与弦歌·····	(120)
	(二)隐士与围棋·····	(124)
	(三)隐士与书画·····	(127)

(四)隐士与诗词·····	(131)
八 隐士的交游 ·····	(136)
(一)知音何处·····	(136)
(二)隐逸小团体·····	(139)
(三)方外友与仕宦交·····	(143)

前 言

对于今天的许多中国人来说，隐士这个名称即使不是完全陌生，恐怕也是遥远而模糊的。至于作为历史人物，则早已“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了。与传统社会中隐士的影响力相比，今天对隐士的注意力显得有些不成比例。尽管隐士赖以托生的社会环境与思想传统已发生根本改变；尽管隐士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已无立足之地；尽管人们的注意力被更“热”的“热点”和更“焦”的“焦点”所吸引；尽管还有许多其他可以解释的理由，但我们仍然感到遗憾：作为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隐士不该受到现代中国人的如此冷落。何况，从隐士身上，今天的人们并非不能找到可供借鉴、可供思考的东西。因为感到遗憾，又因为我们觉得隐士的某些方面对今人仍有价值，于是就写了这本小书。我们的目的是向人们介绍一下隐士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扮演的角色，留下的痕迹，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生活，他们与传统社会的种种联系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有过的影响。

不过，真正做起来却困难重重。除我们自身的局限外，最大的难处是：现代社会与隐士所依托的传统社会差异甚大，要想超越一般史料去体验与把握隐士的思想情绪十分不易。鉴于此，我们采用的主要是以展现基本史实为基础的描述方法，即所谓“面面观”。此种方法的短处甚多，不言自喻。而有一点长处，就是可以让人们对隐士有一个虽粗略而完整的认识。这

与我们的初衷虽不完全吻合,却也相去不远。

马华 陈正宏

一九九六年三月

一 中国的隐士文化

(一) 隐士是什么人

无论你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评价，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着许多相当特殊且耐人寻味的现象。这些文化现象伴随中国悠久的历史而存在，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有形式和内涵。谈论中国文化，谁也无法回避这些现象。这些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中国历史印痕与中国人精神特征。受别种文化熏陶的人对此往往不得要领，即便作为本民族的一员，虽深受其影响，但却难以用清晰的概念和完整的逻辑加以解释，常常因“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思想困扰，无法十分清楚地明白个中奥妙。

隐士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对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略有所知的人都晓得：中国隐士很多。自范曄著《后汉书》独标《逸民传》后，历代正史多数便以“隐逸”“逸民”“处士”等等名目，为著名的隐士树碑立传，记言记行。这些隐士毫无愧怍地占据着篇幅有限的历史册页，与帝王将相、功臣烈士、文人骚客、烈女节妇、酷吏贰臣等众多可歌可泣、可悲可笑、可恨可咒、可思可叹的人们一起，谱写出中国的历史篇章，成为令人艳羡的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

有名有姓有据可查的隐士，除正史记载之外，各种野史稗

抄、小说笔记、地方史乘、诗词曲赋也有可观的记录，甚至有专门为隐士留名的书籍，如《高士传》、《续高士传》等等。如果再加上真正隐没身世名姓的无名隐士（这部分人也一定很多，因为确实有些隐士以“隐”为最终目的。有些人“逃名”失败，也一定有不少人“逃名”成功），那么，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支数量可观的隐士大军便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了。

中国隐士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历史上绵延不断，从未灭绝。据传说，中国最早的隐士在上古尧舜时代便已出现。晋代皇甫谧所著的《高士传》中，记载了从上古至曹魏有名的隐士九十多人。第一个隐士被衣就是尧时人。从上古开始，直至最后一个王朝灭亡，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衰亡离乱时期；无论是名君圣王当政，还是昏庸无道的皇帝掌权，隐士都层出不穷，代不乏人。贤明君王统治时期，不断有圣谕传下，要求“出岩穴之士”，以此作为盛世的一个标志。可是，“岩穴之士”非但出不尽，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岩穴”中去。到了衰乱年代，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被打乱，人们面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威胁，性命不保。于是，当隐士更成为一种较好的选择，既可避乱全生，又可以此对社会提出抗议。故而，“衰乱年代隐士多”。

纵观中国历史，无论哪朝哪代，隐士从未绝迹。隐士们或隐或显、或明或暗，或走到前台，或退居幕后，总是相伴于历史身旁。这样的现象，不能不使人产生一个问题：隐士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在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概括言之，隐士是中国社会中众多社会身份中的一种。我们知道，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各种社会地位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人的社会

身份,也就是说,人在社会舞台上总要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一般说来,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虽然社会身份会随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各种地位的变化而发生转移,但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总是保有一种主要的社会身份。现代社会为人提供了较多的机会,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流动性使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去选择自己的社会身份(当然,这样的自由距人类自身的要求仍相差甚远,但无论如何,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由程度在不断提高)。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每个人的社会身份变化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而且人们的社会身份通常是由外部因素确定的,个人选择的可能极为有限。例如:“士”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就有诸多限制,既不是可以轻易取得,也不是轻易便能放弃。只有通过很少几条途径才能成为士人(这里所说的“士”是指取得一定功名,为社会承认的读书人),而有一些人,如商人、工役就很难或不许进入士人行列。而改变士人身份的可能性又极小,基本上只有通过固定的方式进入官僚集团,取得“官”或“大夫”这样的身份才有可能。这样,在这条狭窄而漫长的坎坷小路上挤满了老老少少的读书人。

古往今来,读书人做官是既容易又困难的。要说容易,真可谓“一举成名天下知”。即使是家境贫寒之人,也可以通过个人奋发努力,再加上运气机缘,往往是一登龙门而身价百倍。清代著名大臣翁心存的经历可以作为例子。陈康祺在他所著《郎潜纪闻》中有这样的记载:

“翁文端公(心存)年二十四时,犹一贫诸生也,其祀灶诗有:‘微禄但能邀主薄,浊醪何惜请比邻。’士当困厄无聊,易作短气语。当公为此诗,岂自料两朝宰相,再世帝师,三子公卿,四世翰苑,功名福泽,

为本朝希有人物哉。”

翁氏的经历可以证明中国历代士人在他们一生的境遇中，常常会出现连其本人也难料想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一种社会身份的变化。伴随变化而来的，不仅是政治地位的浮沉，同时也是思想情绪、生活方式等的改变。

翁心存是幸运的，虽然年轻时也曾发过穷愁无聊的“短气牢骚”，但毕竟还是在仕途上走了鸿运。与之相比，大多数读书人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们尽管在才学上不一定比不上翁氏，牢骚也比翁氏更多，但其结果却与翁氏相反，终生也碰不上翁氏的运气。同样还是清代的事，可以拿来作为上述记载的比较：

“锡、金两县，于承平时，童生应学院试者，一千数百人，而学额仅三十人。世俗之视秀才也颇重，而得之者亦颇难。往往有文学均优，写作俱佳，而僥得僥失，年至斑白，犹溷迹于童子军者。”（薛福成《庸庵笔记》卷六）

所谓“七十老童生”大概就是指的这些人。为什么这些头发斑白，齿牙摇动的老头子至死都不甘心，挣扎着要做一番拼搏呢？原因就在于：科举制度是给人们提供的改变社会身份的一条道路，对于贫困的读书人而言，差不多是唯一的一条路。

正是由于改变社会身份如此困难，所以在中国读书人中间，有一批人采取了特有的方式，在正常的途径之外，开辟出另一些道路，为改变社会身份作了努力，而他们的努力如果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们也就成功了。隐士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有许多隐士在归隐之前也曾按照一般读书人所走的路子去求取功名，当他们发现此路难通时，便放弃这条路，另辟蹊径，做了隐士。例如像唐代的著名隐士吴筠，《新唐书·隐逸

传》记载：

“吴筠字贞节，华州华阴人。通经谊，美文辞，举进士，不中，性高鲠，不耐沉浮于时，去居南阳倚帝山……”

唐代另一位著名隐士陆龟蒙，也就是世称甫里先生、天随子的陆鲁望，年轻时也曾应科举，不中，才绝意仕进。宋代的陈搏，年少聪慧，习百家言，过目成诵，曾经应后唐科举，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这样的隐士，在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他们并非一开始便绝意仕进，而是感到科举成名太困难，终生汲汲于此，也未必能成正果，于是才走上隐士之路。成为隐士之后，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而社会对待他们也不再像对待一般读书人一样，完全换了标准。他们不再被当作读书以求仕进的士人，却成了不需要通过科举做官而获得社会承认的特殊人物。仍以陈搏为例，他隐居山岩，名声却大震，后周世宗皇帝请他到京师，要封为谏议大夫，陈搏固辞不受，世宗也不勉强，送给他许多礼品，又要地方官员“岁时存问”。陈搏通过科举得不到的东西，却通过当隐士而得到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隐士不仅是一种特殊身份的人，而且还享有其他身份所不易获取的社会地位。

之所以说隐士是一种社会身份，首先基于这样的考虑：隐士不仅作为一种个人在社会中存在，而且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而表现了它的生存意义。同时，隐士作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整体。隐士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阐述。这里我们就隐士名称及其古人对

隐士的理解作一些考察，从而认识隐士身份究竟具有什么意义。

隐士一词，最早见于典籍大约是《庄子·缮性篇》：

“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

后世学者认为《缮性篇》非庄子本人所作，可能是假托庄子之名的后人作品。尽管如此，作者还是提出了隐士的名称，并且用庄子式的思想为隐士做了注脚。

所谓“隐故不自隐”，也就是说并非只有在山林之中的人才是隐士，“伏身不见”“闭言不出”“藏知不发”是因为“时命大谬”，也就是说世道大乱，命运不济，故而隐其德不显于世。这里作者提出了隐士的一个重要特征，即：首先在精神上独立于世俗，保有自己的思想独立性；至于形式上如何隐，那是次要的问题。这种对隐士的理解，影响了后代许多人。除了心身皆隐的隐士外，中国还有许多对隐士的提法，比如“隐于朝”“隐于吏”“隐于商”，甚至“隐于学”。尽管这些人不能算是标准的隐士，但隐士的某种特性却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由此可见，隐士文化所蕴涵的深层意义对中国人影响是很大的。

当然，地道的隐士是心身皆隐的。隐于朝只是特例。隐士是不肯出来做官的，如同庄子本人一样。因为他们不做官，所以对隐士又有另外一种称呼：处士。如同待字闺中的少女称为处女，从未出仕的人可称处士。当然，处字还有另一层意思，也就是静，知命乐天，清静无为，以不变应万变；这也是处士的做人原则。因此荀子才说：“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

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处也可以理解为居处之处，也就是所谓“不官于朝而家居者”。

隐士另一个别名叫做逸民。孔子说过：举逸民而天下之人归心焉。《论语》称著名隐士如伯夷、叔齐等人为逸民。逸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超逸脱俗。隐士由于远离世间纷争，自然可以潇洒人生。《易·遯卦》：“上九，肥遯，无不利。”《程传》解释道：“肥者，充大宽裕之意；遯者，虽飘然远逝，无所系滞之为善。”

正可以用“肥遯”作逸民的注脚。

逸字的另一个意思是“遗”，也就是遗世。朱熹在为《论语》作注时指出：“逸，遗逸，无位称。”如果把“逸”的二种意义加在一起，就可以完整表现出隐士的面貌：既是遗世独立不求名位，又具有超拔尘俗、飘然世外的风姿。逸民的称谓确实符合隐士的身份。

无论是处士、逸民，还是其他如幽人、逸士、隐君子等等称呼，都可以作为隐士的别号。而隐士的精神使他们超出一般人之上，故而又称他们为高士。《易·蛊卦》：“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皇甫谧《高士传序》云：

“孔子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洪崖先生创高道于上皇之代，许由善卷不降节于唐虞之朝……然则高让之士，王政之所先，历浊激贪之务也。”

隐士正是由于在人格与精神上超越一般士民，方可称“高士”。而社会对隐士的青睐，也恰恰在于他们以“高尚其事”为标准、目的，同一些汲汲名利、贪恋权势的人有所区别。不论隐士是否都能真正做到“高尚其事”，也不论隐士是否真正对社

会起到“历浊激贪”的作用，至少在人们心目中，隐士的形象是比较好的，人们赋予隐士以美好的人格理想。作为一种标准，用来同某些人相比，隐士是可以配得起“高士”称呼的。

通过对隐士名称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对“隐士是什么人”有一种初步的了解。我们可以这样说：隐士作为社会中众多身份的一种，不仅具有个人意义，而且在中国古代人，特别是读书人中有着特殊的意义。隐士是以不仕为自己身份特征，以追求精神的独立和超越作为理想境界。同时，隐士还是一种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们所具备的飘逸、潇洒、清高、淡泊，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意义的品格，为世人所仰慕。一代又一代的隐士，就这样存在延续下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隐士文化。

（二）隐士文化与中国农业文明

中国隐士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具有相当深厚且成份复杂的社会土壤。在分析隐士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中国古代高度成熟发达的农业文明对隐士文化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是任何一个研究隐士文化的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农业社会是人类历史上重要阶段，农业文明哺育了人类。今天，立足于现代工业文明的角度看待农业社会与农业文明，往往更多地看到这种文明的短处，尤其是生活在近千百年以来的人们，由于自身生存环境的变化，价值标准的更迭，已经很难理解生存在农业文明之中的人所具有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态。虽然人们承认任何社会环境中人都具有合理存在的理由，但真正做到设身处地地理解和对待别人，却仍然是十分困